

资产阶级社会动力学

——吉登斯的《资本论》解读与当代社会发展

王庆丰¹, 刘建卓²

(1. 吉林大学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2.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在吉登斯看来,《资本论》在马克思的毕生著作中居于“基础性地位”。《资本论》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及其经济运动法则——资本的扩张性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称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学”。吉登斯指出,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已经发生改变,《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的扩张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加资本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塑造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力量。除这一因素外,全球化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变革同样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吉登斯认为当代的社会发展应当重新塑造“市场、政府和市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平衡,从而驾驭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断裂和对抗。

[关键词]资本的扩张性;全球化;知识经济;社会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7-0029-07

吉登斯把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看作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位代表性思想家。他通过对三大思想家的著作十年之久的反思,系统地梳理出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条明显主线: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其中,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建构了其现代性理论。吉登斯指出,马克思“对于理解影响现代世界之塑造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力量至关重要,这种力量当然就是资本主义”^{[1]1}。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部披露性著作中,吉登斯尤其看重《资本论》。他指出,“《资本论》在马克思毕生著作中”居于“基础性地位”。^{[2]序言3}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猛烈批判。吉登斯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是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揭示为前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考察,才揭露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称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学”^{[2]60}。

吉登斯解读《资本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构自己的现代性理论。马克思之所以被吉登斯称为“古典”现代性理论,就是因为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立足于早期资本主义的时代性产物。然而,20世纪末期同时发生的两场革命——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

[收稿日期]2016-05-09

[基金项目]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资本论》与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研究”(14JJD72000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NCET-13-0249)

[作者简介]王庆丰(1978-),男,河南林州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长白山学者”特聘教授,从事哲学基础理论与《资本论》研究。

“断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19世纪的《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在多大范围内还能发挥作用,成为吉登斯在研究马克思时所思考的首要问题。吉登斯在解读、反思和批判马克思《资本论》的基础上,力图切中当代的资本主义现实,重新建立起现代性理论范式,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谋求一条新的出路。

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动力

在亚当·斯密之后,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政治经济学出现了两大主题:第一大主题是“动力学”,第二大主题是“济贫论”。“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就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发表后的半个世纪,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地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3]毫无疑问,“动力学”主题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获得迅猛发展的原因是什么。伴随着这一主题的另一大主题就是“济贫论”问题。“当贫困的意义被揭示时,19世纪也即将到来。分水岭大致是在1780年左右。在亚当·斯密的巨著中,济贫尚未成为问题,仅在十几年之后,在汤森的《论济贫法》中,它就上升为一个广泛的议题,并且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从未从人们的头脑中消退过。”^[4]在早期资本主义获得迅猛发展的同时,整个社会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人口。因此,“济贫”以及这种贫困产生的社会根源也开始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大主题。这两大主题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了融合,马克思对资本的双重态度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的秘密,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贫困的社会根源。所以,吉登斯认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揭示,展开了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一判断是恰当的,也是富有启发性的。只不过吉登斯看重的是第一个主题——动力学主题,而马克思本人看重的则是第二个主题——济贫论主题。

吉登斯在谈到《资本论》的主题时,明确指出:“尽管《资本论》所涉及的大多是经济分析,但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的首要兴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学。也就是说,《资本论》的首要目标就是要考察奠定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基础的动力,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法则’。”^{[2]60}“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学”就是吉登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定位。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具体地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现象和细节,而是去除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有关价格、利润率等有形范畴的影响,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及其经济原理。这一定位符合吉登斯的社会学家的身份和立场,并且这也确实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

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强调的那样,是一个商品生产体系。商品具有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者组织生产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基本点。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二重性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表现形式罢了。“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5]抽象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基础,而有用劳动则是使用价值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交换价值。在获得的交换价值中包括两部分价值:一部分价值是资本家投入的价值,另一部分价值就是我们所谓的利润。马克思认为,从总体上说资本家是以商品的真实价值来购买或出售它们的,但他们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也就是获得利润,否则就是无意义的商品流通。

对于马克思来说,利润只是一个表象,并且是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表象。“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源泉。可以说,利润是剩余价值可以看得见的‘表面’现象”,它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盖,被抹杀了。”^{[2]65}正是在利润这里,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隐匿在背后的秘密——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从总体上看,商品流通遵循着等价交换的原则,利润或者说剩余价值不可能在流通领域产生。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在于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在一定的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在每个平均工作日里所能生产的产品数量,比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成本即工人所获的工资要多得多。工人生产所超出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由于价值是由劳动创造或决

定的,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实际上就是对工人剩余劳动(亦即无酬劳动)的支配。穿透利润的表象,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剩余价值理论为人们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正是以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为基础而展开的。但是,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和剥削的论述都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学”的。资本主义社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在马克思看来就是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亦即现代社会中“资本的增值本性”。吉登斯把马克思所揭示的这种资本的增值本性称为“资本的扩张性”,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对利润的追求是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但是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增值会受到两个社会发展趋势的挑战:一是利润率呈不断下降趋势的规律,一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两个都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并且是不可解决的矛盾。“马克思论证的总体目标在于,尽管资本主义最初是围绕自由市场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体系中,商品可以在单个企业的开发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趋势却破坏了资本主义经济所赖以建立的经验性条件。”^{[2]68}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要经济矛盾就表现为扩大利润的需要与利润率呈不断下降趋势的规律相对立。利润率下降的结构性趋势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来说是根深蒂固的。整个资本主义建立在竞争利润的基础上,技术的改进尤其是生产过程中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便成为所有资本家在市场生存竞争中的主要武器。长此以往,便会使得每个资本家在不变资本上所投入的资本比例整体提高,从而导致平均利润率水平的下降。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也指出,当然这并不必然导致经济中总体利润的绝对下降。要么通过延缓不变资本的相对提高,要么通过提高剩余价值率,都可以作为暂时抵消利润率下降的有效因素。但马克思更为强调的是,这种暂时性的对策,比如延长工人的工作日,降低工人的劳动报酬,必然会导致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对劳动者剥削的强化,从而使劳动阶级的大多数处于贫困状态,以致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有规律地发生周期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明显体现。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交换主要是由使用价值所控制的,对需求的了解成为调节需求与供给的源泉。但是,随着商品生产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扩展,这种调节纽带就消失了。在生产和消费方面,资本主义不仅是不受任何特定机构调节的“无政府”体制,而且其“本质上还是一种扩张性的体制,其基本动力来源于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2]70}。因而,在所生产的商品数量与它们在平均利润率上的可销售性之间出现任何明显的不平衡,都会给系统造成危机。危机就是生产的扩张超过了市场的吸收限度。马克思指出,一旦生产过剩的情况发生,就会带来恶性循环。由于利润率下降,投资也相应下降,工人的工资下降,甚至部分劳动力不得不被解雇,从而导致工人的贫困化和产业后备军的扩大。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动力将导致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发展,建立在阶级剥削关系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是围绕着“资本的扩张”组织起来的。它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不是为了已知的需求进行生产,这就必然会出现供需不平衡,引发经济危机。因而,危机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痼疾。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并且这种危机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毁灭。吉登斯反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结论。他认为马克思没有对危机的性质进行系统的分析,也并不试图追溯导致危机真正发生的多重因果链,因而也就无法全面地理解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与马克思的消极态度不同,吉登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持肯定态度。他指出“危机并不代表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相反,它所代表的是一种调节机制,使资本主义能够从其遭受的周期性波动中生存下来。危机的作用在于保持一种平衡,并使进一步的增长成为可能。”^{[2]71}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来讲不仅不是致命的,相反却是有益的。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言起到了凤凰涅槃的作用。“在危机期间,一些效率较低的企业将会被淘汰,于是那些保留下来的企业从而可以分割被淘汰者原来的市场份额,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扩张期。这样,循环就开始了新一轮,另一个上升阶段开始了。”^{[2]71}

二、《资本论》中的“圣保罗”

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成功地侵入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盲点,即穿透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有关价格、租金、利润率等有形范畴的影响,不仅深刻地揭

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特征——商品化的本质,而且揭露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秘密,使其最终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动力、扩张本性及其经济运作原理公之于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动力机制的洞悉不仅无与伦比,而且迄今为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仍然具有弥足珍贵的核心重要性。充分肯定《资本论》的同时,吉登斯也毫不讳言,“每一种形式的实践理论都存在其圣保罗,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2]序言4}我们知道,在《新约》二十七部书中,至少有十四部被认为是圣保罗所作。即使现代学者认为这些书中有四至五部实际上是其他人所作,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圣保罗是《新约》唯一重要的作者。吉登斯在此使用“圣保罗”,显然是一种隐喻的说法。他想表明的是,对于任何一种理论都存在着新旧之间的冲突,都存在着历史时代的局限性。

吉登斯引用阿克顿 1895 年在剑桥大学发表的就职演说表达了这一信念:现代欧洲与其过往时代之间存在着一条“显而易见的界限”。自古以来的延续性纽带被剪断了,19 世纪的现代世界建立在新秩序的基础之上。世界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的影响下,运转在一个与往昔截然不同的轨道上。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氛围和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经济变迁,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马克思思想兴起的具体背景。吉登斯认为,马克思生活的 19 世纪,资本主义及其问题才初露端倪。即使他对 19 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显得多么尖锐和深刻,他也无法准确地预测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张力。无论我们对《资本论》“抱多大的同情态度,无论如何,其中的确出现了某些错误”^[6]。从吉登斯的视角看,在全球化的今天,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时代性错位: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所依靠的资本的扩张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追加资本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塑造现代性的唯一力量”^[11]。虽然在现代性出现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即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创立是首要的,虽然将资本的扩张性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除了这一因素以外,全球化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变革同样对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断裂”,吉登斯开始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提出了诸多质疑。相对于 19 世纪 20 世纪末期同时发生了两场革命——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吉登斯指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革命为社会发展带来了变化“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已发生了改变”^{[7]67}。这明显体现在,金融市场和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它们正在超越工业制造而逐渐占据支配性地位,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

虽然,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就已经宣布现代社会进入了世界历史,但是只有到了 20 世纪末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进入了世界历史,这主要表现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在我们的时代,全球性的金融市场已经超过货物和商品贸易而趋于主导位置。这尤其体现在货币交易中,全球外汇市场的日均交易量实现了成万倍的增长,跨国银行的储蓄和贷款的资产总额近年来更是飞速攀升。吉登斯指出,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知识作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动力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知识经济虽然并未所向无敌,但也在顺利地朝着目标前进。同全球化的更广泛的其他方面一道,“知识经济标志着经济活动性质的一大转变”^{[7]70}。信息和通信技术是这种新型经济的动力媒介,科学技术和人类的符号技能在生产率也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本质性的作用。今天,与科学技术相关的行业诸如计算机、通信、生物技术等普遍成了经济发展的活跃部门,零售和配送等多数行业的完成过程也普遍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此外,观念、形象和品牌在刺激利润增长方面也远比生产效率重要得多。因此,在知识经济越来越趋于主导地位的今天,有效率的生产是一个赢利底线、是利润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现在,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生产率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已不再那么依靠在生产过程中追加资本和劳动力”^{[7]68}。

同时,科学技术也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所需劳动力的构成比例。今天,经济活动的承担者主要是知识工人和一些并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它们所拥有的最昂贵的财产就是这些工人自身所具备的技术和知识。以微软为例,吉登斯指出,微软最值钱的财产是科学技术赋予它们的市场价值,而不是土地和原材料等传统意义上用于评估资产的有形存在物。当然一个国家和企业的经济要想更有竞争力,其产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必须具有极大的弹性。对劳动力市场来说,弹性就意味着解除管制,这必然会使工人在经济风险面前表现得更加脆弱。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是否必然会导致贫困人数和失业人口总和的增加呢?对此吉登斯进行了社会调查并给予了一个否定回答:

在差不多所有的国家里,现在的工作总数比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以前要多得多。

因此,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发展主要驱动力的转变使工人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缓解。现在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像马克思所预计的那样,是一个充满剥削的时代,是一个阶级矛盾激化的时代,是一个工人遭受贫穷和后备军大量存在的时代。吉登斯指出,我们必须承认,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为其自身公民创造了两大极为重要的成就:内在的富足与自由民主的政治架构。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个阶段曾经像今天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几乎每一个地方的人口都享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一定的公民权利。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吉登斯对马克思进行了委婉的批评:“无论资本主义在塑造‘新’、‘旧’殖民主义的过程中使世界其余地方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一种理论如果没有考虑到它的‘成功’,也就将是一种偏颇而教条的理论。”^{[6]257}

马克思既没有预测到经济结构和经济性质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也没有预测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所具有的自我调节和巨大张力对于社会成员之间矛盾的缓和作用。因此,马克思预期社会主义革命将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发生。但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和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消退,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计落空了。“革命的社会已经瓦解,他们的前卫部队躲进了历史的杂物间。”^{[8]67}工人中的许多成员失去了革命的思想,他们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塑形社会发展轨迹的力量。“革命观念的丧失,至少社会主义革命观念的丧失——因为它作为一种抱负确实已经死亡了——是今天到处可见的社会主义‘低落’的主要因素之一。”^{[8]66}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为阶级矛盾或阶级冲突准备了一个理想的归宿——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然而,这一美好愿望本身却表现出了黑格尔“普遍历史”的强烈回响。马克思虽然不愿通过对未来理想社会蓝图的详细描述来再制造另一种版本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但是,吊诡之处在于,这种做法却恰恰使其自身留下了一种强烈的乌托邦主义潜能。

通过对《资本论》的反思和批判,吉登斯告诉我们: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已经证明,与任何其他社会相比,资本主义都更加深远地改变了和改变着世界。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看作一个动力学的过程是对的,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动力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走向衰亡,无论如何都是成问题的,因为马克思低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双重历史性革命。

三、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架构

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双重革命造就了一个比马克思的时代更加失控和具有风险的多元结构世界。我们已经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天翻地覆的秩序变革。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首要的现实。经济全球化不仅体现在世界金融市场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出现了金融市场的“全面全球化的经济”,最重要的一方面还体现在各个民族经济之间也获得了日益紧密的联系。就全球化的性质、原因和后果而言,“全球化观念”表示的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全球化绝不仅仅只是经济的全球化,它同时还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全球化。从整体上讲,全球化的力量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技术的进步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世界不仅对“我”发生着联系,“我”对世界也产生着真实的影响。信息的快速传播一方面给人们带来了一种更加积极和开放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却也深刻地瓦解了日常生活,甚至消解了传统和习俗,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对各种信息进行及时的反思。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变革,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们生活的改变,进而是反思性社会的形成,这其中任何一项都意味着一系列发展的综合,而且每一项都与其他各项紧密相连。

吉登斯指出,在各个层面上,“全球化都是一系列高度不平衡的进程,其前进过程中充满着断裂和对抗。”^{[7]70}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存在着诸多矛盾——各种断裂和对抗。但是,矛盾并不“纯粹就是一种负面的现象,相反,它很有可能加强那些激起进步性社会变化的张力”^{[6]255}。二战以后,西方国家产生了两种主导性的政治思维:以传统福利国家为基础的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抵制全球化的变迁,而立足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则任其发展。吉登斯认为,既存的这两种一元论的政治意识形态要么把政府、要么把市场看作协调社会领域的手段,这已经不能对这个复杂的社会作出有效的反应。现在,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有效的政治规划去驾驭这一全球秩序的变迁。立足于英国的现状,复兴社会民主主义,拯救资本主义社会,就成为吉登斯给自己提出的理论和政治任务。

为了避免落入马克思的乌托邦神话,吉登斯认为政治策略的制定必须兼具理想和现实的双重意蕴。“如果没有理想的话,政治生活就一无是处;但是,如果理想与现实可能性无关,它们就是空洞的。我们既需要知道自己想要创造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也需要知道向这种社会迈进的具体方式。”^{[9]2-3}就现实而言,全球化的进程是今天最大的社会现实;就理想而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9]2}吉登斯认为,他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构想正是他所坚守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与全球化的现实接轨的产物。“理论之体必须有政策骨架的支撑,不仅仅是从理论上认可其所作所为,而且要提出具有更明确的方向感和目的感的政治框架。”^{[9]3}理论如果没有具体政策框架的落实,必然会堕入乌托邦。为此,吉登斯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具体政策框架。在吉登斯看来,每场革命都包含一系列复杂的因素,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加以判断。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革命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同时也蕴含着潜在的风险。乌尔里希·贝克干脆直接把我们所处的社会称为“风险社会”。因此我们必须对全球化有活力的一面和威胁性的另一面都进行有效的管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超越政府和市场对立的传统思维,充分运用市场、政府和市民社会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三者都必须从当代社会变革的角度来重新加以审视和改革。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过程中,不仅是资本,市场也是必须被扬弃的。因为市场作为流通领域是资本增值最终实现的地方,另外市场经济由于受资本增值的驱动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吉登斯指出我们需要放弃“市场必然是恶的”立场。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只有市场才能提供给我们经济繁荣的机会;并且市场本身有助于公民权利的获得甚至有助于减少不平等。就此而言,“不再有已知的对市场经济的替代物,也没有其他制度能够比拟市场竞争产生的好处。”^{[7]167}但是,维持伦理价值的性能始终是市场自身缺乏的,因而始终是其自身不可克服的问题。由于市场的巨大作用,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把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商品。而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不是任何东西都能够成为商品的。有些事物和行为如果成了商品就意味着道德观念的沦丧,意味着对我们所坚守的价值观念的腐蚀。当代社群主义思想家桑德尔对市场的道德界限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探讨。吉登斯认为,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伦理问题必须诉诸法律得以确定并通过市民社会加以维持。稳定的市民社会是保持市场繁荣的前提,市民社会的普遍信任是法治和规范充分施行的基础。因此完善的市民社会就构成了“第三条道路”政治中用以辅助市场运作和民主国家的一个基本要素。

一个多元社会要想获得健康的发展,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是必不可少的。在吉登斯看来,政府职能的重新塑造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主要当务之急。在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市民社会的辅助性功能,是国家和政府不可取代的。国家职能的特殊性就在于对市场和市民社会进行干预。为了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在当今世界,我们比过去需要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政府管理。”^{[7]85}只是这种管理必须明显区别于过去时代的“管制”。在经济方面,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必须确保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在此一任务的前提下,还应该担负起帮助市场和技术进步的职能,而不是简单地约束市场和技术的变革;在社会生活方面,政府应当促进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以遏制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并为个人提供自我实现的机会。

政府和国家职能的重构与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密切相关。在初级资本主义阶段,工业制造是支配性角色,政府和国家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管制好工人,协调和缓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社会冲突,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在全球化经济中,除工业生产以外,金融市场在知识产业的推动下逐渐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并且由于市场信息复杂性地驱动,金融市场正在日益多样化。虽然保障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对生产性资本的控制和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依然是政府的主要任务,但对于知识经济时代而言,政府工作的重心并不是管制,而是要努力构建一个“知识基础”来释放信息经济的所有潜力。在传统经济中,创新经常是独立研究、发展和生产过程的“无意识”结果,而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创新更多地来自企业之间的自觉合作。为了促进创新,政府应当在保证不产生垄断的前提下主动出击去制定促进企业联盟的政策。吉登斯指出,现代社会可以有若干条可能的政策路径来推动这一进程。比

如,在集中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框架条件”层面,对研究集团中的企业投资或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合作进行减税,或者提供科技攻关资助,当然这种资助主要是投资而非任何种类的直接补贴。而这种投资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推动人力资本发展的主要动力只能是教育。传统观念上,教育被视为是对人生的一种准备,其根本观点仍然是把教育看作获取迈入成年所需资格的一种手段。今天,教育理念本身也受到了知识经济的改造,教育更加集中关注个人能够终生发展的那些能力。

“市场、政府和市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平衡作用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架构。全球化进程中,如果“市场、政府和市民社会”存在着断裂和对抗的话,社会发展就有可能出现动力不足,进而陷入无序状态。例如,如果市场没有很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现代社会就将失去公平和效率,丧失其应有的经济活力;如果市民社会不对市场的伦理和道德界限进行规制和维持,市场经济及其所引导的价值原则就会侵袭整个人类生活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将沉入到金钱的冰水;如果政府不履行自己的管理职能,不仅市场经济的创新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会大大削弱,整个市场经济也无法保证整体上的稳定。因此,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架构就是保持市场、政府和市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及其相互作用。

吉登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解读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学”。将资本的增值本性看作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资本的扩张性体制及其经济运行原理,这确实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本质性判断。问题在于,当吉登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由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这一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判断是否依然起作用?吉登斯的确揭露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架构问题,但是这种揭露却是从本源退回到了现象。今天资本的扩张性不仅没有消退,而且实现了越来越普遍的统治。只要资本的逻辑在现代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原动力的判断就具有其合理性的意义。表面上看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资本增值或扩张的本质性要求,是被资本的增值本性所支配的。资本的增值或扩张性仍然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最为本质的驱动力。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也就是“时代性”和“人类性”的统一。马克思的《资本论》是19世纪的、立足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论》。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资本论》受到其历史时代的限制,它没有也无法预料到20世纪以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形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而随后西欧先进国家的经验则有助于形成一种与马克思原来的观点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2] 序言4}吉登斯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状况——全球化与知识经济,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了反思与批判,重新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吉登斯并没有因此否定马克思的伟大和洞见。他指出“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接受这样一种陈腐的观点,即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推翻’了马克思的理论。即使在今天,马克思的著作仍然提供了一种社会历史观念,相对于后来其他作者的观点而言,它体现出弥足珍贵的价值。”^{[2] 序言4}吉登斯在其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中依然保持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所蕴含的价值诉求,这是马克思思想中永恒的“人类性”价值的体现。

[参 考 文 献]

- [1]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2] [英]安东尼·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M].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3]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7-8.
- [4] [英]波兰尼.大转折: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96.
- [5]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0.
- [6] [英]托马斯·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M].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42.
- [7] [英]托马斯·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M].孙相东,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 [8] [英]托马斯·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M].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9] [英]托马斯·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杜娟)